

从全国市场看 18 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

——80 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牛 贯 杰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康乾时期经济显著增长现象的认识似乎已为不争之论。清代前期,“经济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超过历代有为的王朝”¹,“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²。

就中国经济史学的地位而言,“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确实占有一种‘一家独大’的特殊地位”,“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我国的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³因此,清代经济史可谓中国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什么是康乾时期经济发展最为鲜明的外在标志,或者说,理解康乾时期的经济发展由何入手,何以集中体现其发展水平,这一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似乎仍不明确。上世纪 3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史学中最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也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⁴,当然更是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起点与终极关怀。

然而何谓“资本主义萌芽”,学界却莫衷一是,存在很大分歧,仅萌芽产生时间就有“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不同观点。其中,资本主义产生于明清之际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看法⁵。

吴承明为我们从宏观上提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权威看法⁶。他指出,资本主义萌芽应从三方面来考虑: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萌芽是一渐进过程,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萌芽的历史是平淡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它的难处。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有一定的量。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

应具有延续性。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资本主义萌芽”具有平淡性、反复性和延续性等特点,是一开放的研究视角,同时自然也充满了歧异与不确定性。具体到清代经济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开放性为我们提供出极大的讨论空间,出现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成果;然伴生而来的歧异、不确定性又难以切中康乾时期经济发展的要害与关键,往往流于量的积累、频度、广度的增加等泛泛而论。

90年代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渐趋冷落。李伯重在充分肯定“萌芽”研究历史贡献的同时,从学理上进行反省和批判,将其定性为一种学术“情结”。他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首先,体现出一种比较史观,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其次,打破和摆脱了“中国停滞论”与“冲击——反应”模式,指明中国历史变迁动力来自本土的正确方向。第三,基本弄清诸如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重大问题的历史事实,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弄清。从学理上分析,其关键原因在于,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谁也说不清”,更遑论何谓其“萌芽”了。“萌芽”概念未弄清前,其研究自然也作为一种建立在假设预置基础之上的讨论,因此李伯重将之归结为研究者的“一种愿望”,即“资本主义情结”。⁷由上所述,尽管康乾时期的经济面貌已有大量“萌芽”研究的深厚基础,然对其进行学术史梳理,从混杂、多面向的历史实貌中找出能够恰当鲜明体现其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体,实有必要。

尽管学界对清康乾时期的“盛世”提法持有争议,然对其时经济发展显著却存在共识。“我们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毫无疑义,应当把各个历史时期交换的发展和变化置于首要地位,大力去探索它。那么,从何着手去进行这种探索呢?回答是——从市场着手”⁸。

综观清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实况,结合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进展,可以看出,市场,无疑是解读清代经济史的绝佳切入点,亦最能集中体现、衡量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市场:触摸“康乾盛世”经济脉动的不二法门

康乾时期的市场问题并非单纯的在前代基础上的承袭与发展,而是在市场内涵、市场机制方面均开始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转变,这或许才是康乾“盛世”真正重要的经济成绩。概括而论,17——19世纪的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经济全国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全新阶段。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中国经济史学“国际化”倾向的不断增强,市场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要注意交换,不宜只重生产;在商业史的研究要扩大视野,不宜只着眼于商品”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市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这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紧密相联。西欧市场“16世纪开始的根本性转变,18世纪晚期完成,西欧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面临的已是全社会和国际性的大市场”。¹⁰对西方历史学家而言,“似乎没有比‘民族市场’这一古典概念更言之成理的了。这一概念确指某个政治地域业已取得的经济统一性,该地域必定相当宽广,其范围首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领土国家’,也即是从前人们更常说的‘民族国家’”¹¹。“如果没有单一的民族国家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现代世界是无法想象的”¹²。

可见,在西方史家眼中,“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共同构成西欧崛起的两大主因。而且,西欧的市场经济发展与民族国家建构完全交织缠绕在一起,在双方对抗融合的矛盾互动中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彭慕兰将这种思路引入中国研究,指出尽管“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社会就是由零散和孤立的社区组成”。具体到清代而言,“尽管这个帝国不具备忽略地方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势力,但它确实在其整个地域中引导着重要的人口、资源和观念的流动。这些早期的网络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市场粗陋的雏形;它们还因不同的原因和以不同的逻辑联系着一个融为一体的世界。”¹³

当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欧不同。也正因如此,相对于西方学界在“民族市场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命题基本达成共识的情形,关于中国历史上市场内涵、发展水平、作用、动力等问题的讨论与分歧则要激烈、复杂得多。上述彭氏循此思路,通过对中西历史的比较,却得出与从前东西方经济史学界均大相径庭的结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建立一个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其结论可归结为:“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¹⁴其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然其研究过程却不失为清代市场复杂性的一个绝好注脚。

清代是否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是清代市场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市场是否能集中反映清代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旨所在。如前论及,民族市场在西欧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79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巨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中将市场经济标于显著位置,被定位为西欧400年来经济活

动的第二层次（第一层次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第三层是资本主义）。¹⁵

相比而言，中国史学家对本国市场史的研究及理论反省并不逊色。从时间上讲，中国学者对中国民族市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关注，早于布氏著作问世近 20 年，在 1960 年代初一度成为争鸣焦点¹⁶。以研究基础而论，中国学者对民族市场问题发生兴趣主要源自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而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方经济史理论脉络当中占据着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因此西方学者即使在理论探讨方面也不具强势地位。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恰恰在于对市场兴起的强调¹⁷，当然马克思对经济史理论的贡献并不及此¹⁸。其后布罗代尔集大成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更证明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研究意义重大。布氏发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有时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经济’”¹⁹。

二、20 世纪 60 年代：围绕“民族市场”与“统一市场”的讨论

有关国内统一市场热烈讨论的起点，出自伍丹戈 1959 年编著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一书。该书批评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时开始”的做法，主张应首先“对这个大变动以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况和它本身已经有的变动”入手，（可见 8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早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就已涉及，并非新解）进而提出，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重要标志便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是缓慢的和逐渐的，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即从第十世纪开始显露了一些迹象，到十六世纪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化，最后到十九世纪初叶才表现出了和以前有显著不同的新的情况”。²⁰

伍丹戈首次提出“统一的国民经济”概念，“其所谓‘统一的国民经济’或‘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就是指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而言”²¹，其构成要素有三，即“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商业交通的发达”。伍氏认为“统一的国民经济”初步形成于明代中叶，到了清代，“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²²，“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联系比明代更密切的国民经济整体”²³。同时，作者也看到“明代中叶以后，全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的不平衡”，并不否认广大落后地区“仍旧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闭塞状态”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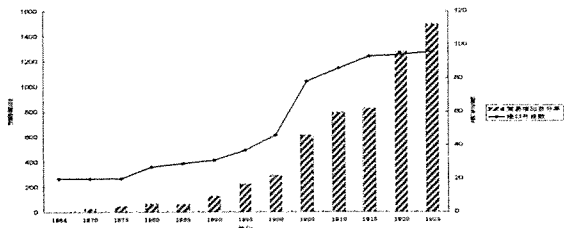
然而，作者在分析此种不平衡性的原因时，并未将“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置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恰恰表示出极大的宽容和谨慎的乐观，强调

二者间的连通转化作用。作者指出,“但是这种贫困的、广大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固然有妨害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却也有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如经营纺织的农民家庭,虽然不向市场购买布匹,可是有些地方却需要向市场购买原料和工具。因此,明清以来的江南地区,既是封建国家赋税和地主阶级地租剥削最惨重的地区,也是商品经济全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个特点产生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产生了全国范围的密切的经济联系,产生了一个具有发达的商业城市、商业交通和商业机构的国民经济体系。”²⁵

孔经纬则不同意伍氏“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形成统一市场”的观点。他指出,“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的主要标志有二:一是国内已有各区域间的密切经济联系,二是卷入市场交换关系中的人要有广泛性。孔经纬认为,伍丹戈之误在于“把通常的大小市场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状况与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的形成混为一谈”。而当时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并不具备,“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并依赖市场。在生产产品中真正变成商品并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与广大下层人民发生交换行为的部分,甚为少见。”孔氏认为,明清之际促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动力并非“商品经济的不断增长”,未能冲破“封建经济的分割性和地方性”,然却未作出具体解释。²⁶

孔经纬将中国“统一民族市场”的形成时间界定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他认为,民族市场是一历史产物,既“不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或实现其专政以后才形成的”,如“英、法早在十五世纪末以前即已有了民族市场”;也“并非意味着封建制度和封建割据状态的完全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内市场”混为一谈。然而,作者对明清时期的市场问题并未过多论及,仅归结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而是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直指“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孔氏根据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²⁷得出,其时绝大多数农民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如安徽、河北、河南、山西、福建、江苏六省的2370户农家中,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的数量与全部消费数量的比例如下:食物占16.8%,衣服占81.7%,燃料占11.3%,医药与生活改进方面为100%,个人嗜好占99.7%,器具设备占95.1%,杂项占99.2。农民也开始广泛使用货币:1922年河北盐山农民的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56%,支出占总支出的71%;1925年四川成都附近的农民,佃农货币收入占84%,货币支出达93%,半自耕农货币收入占88%,支出占65%,自耕农货币收入占87%,支出则占40%。至于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港口贸易的变化则更为显著,根据其论述制出下图。

图1 1864—1926年的港口开设数与贸易增加比



孔经纬着重强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的显著变化，认为“不能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与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经济之间划等号”。但他同时也指出，中

国的民族市场“正是在封建制度尚存在，封建割据状态还未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还未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起点较低，不宜估计过高。他总结近代中国农村市场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中国农村内部的市场仍带有某种程度的地方性质；二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完全受价值规律所支配，有许多人为因素；三是绝大多数的贫农，甚至在乡村内部的市场上往往还不能以直接出卖者的资格出现。此三个特点，其实无非是想进一步强调中国近代市场发育的复杂性，既有外国列强介入，又有封建势力的盘剥。²⁸

李湘对此观点并不同意，认为“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市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继续重申伍丹戈观点，认为统一市场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前。李湘强调中西历史的不同差异，指出民族市场其实仅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欧洲各国要求打破封建割据问题，欧洲“促成民族市场形成的一些动力，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李湘的结论为：中国在明清时代所形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情形与欧洲国家所出现过的“民族市场”是不能混淆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一定是“民族市场”。中国到明清时代，在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基础上，全国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逐步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但这种情况与欧洲“民族市场”不同，没有出现城市新兴“市民阶级”促进“民族市场”情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全国市场内没有占主要地位”。²⁹

陈诗启、杨志信对“统一市场”问题未多涉及，而是就“民族市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陈诗启强调民族市场概念中“民族”两字的分量，认为民族市场必然体现民族的利益而独立发展，如果抽掉民族利益而单纯从市场发展的范围和程度来研究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则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民族市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市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³⁰ 杨志信则认为，明代的统一国内市场就是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的，并不一定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为前提。³¹

李家寿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为史料基础，在此次争鸣中实证方面可谓最为有力，提出“中国民族市场形成于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年”的观点³²。他亦强调“民族市场”的“民族”性，与国内市场的涵义并不相同。他论证了这一时期民族市场的形成有七大特征。第一，交通运输在这个时期内获得较快发展；第二，地处偏僻的边远地区逐渐卷入全国统一市场；第三，民族工业产品在全国获得广大市场；第四，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蚕丝中，新式缫丝工业逐渐替代手缫丝业；第五，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工商业城市；第六，市场势力和货币权力对农民具有统治作用；第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

此次学术争鸣未能推动“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的解决，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而问题没有澄清，却恰恰是这场争鸣的意义所在。

首先，争鸣因双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史论界线的不同理解而起。本来，双方均从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入手，在理论指导方面别无二致；且双方均承认中西史实的差异。然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何为西方史实、何为基本理论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这是导致这场争鸣的主要原因。正如孔经纬回应中所讲，李湘虽不同意中国有民族市场，但他所谓的“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在颇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欧洲民族市场的翻版”，“问题的实质在于他要在否认中国社会有民族市场的同时，作出中国统一市场（即民族市场）早在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和鸦片战争前即已形成的结论”³³。

其次，明清市场研究的理论困境。关于明清时期商业及市场经济得以巨大发展的结论，学者似乎并无异议。然而，学者往往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线性演进的前提下，陷入到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统一市场（至少具有萌芽性质）的两难选择。“西欧所以在十五世纪末以前形成了民族市场或统一市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关系和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已开始解体”，而“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主要仍属于自然经济。请问在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没有开始解体的情况下，怎能设想有‘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呢？”³⁴

再次，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定位问题。争鸣背后亦反映出学者对近代经济发展水平认识上的分歧。此种分歧背后其实是关于如何看待外国侵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陈诗启认为，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过高估计，除沿江沿海及铁路所及地区外，广大农村内部的经济联系相当薄弱，国内市场存在分裂状态，

这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有直接关系,因此近代中国丧失了形成民族市场的可能性,发展起来的是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市场³⁵。而主张“鸦片战争前已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学者则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根本堵塞民族市场的形成机会,只起一些阻碍作用,有时甚至还刺激了民族市场的发展”³⁶。

三、20世纪80年代:吴承明及其清代国内市场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和经济史研究的累积进展,市场在清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地位再次受到关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198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³⁷市场成为衡量清代经济水平的焦点,牵涉整个清代经济发展还是停滞,或发展与制约并存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由此引发关于清代经济史的讨论更加深入,进而形成一场从国外波及国内、涉及中西历史比较的学术论争³⁸。

吴承明无疑是清代市场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先生已经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³⁹。吴承明回顾个人研究经历时谈到,他从1981年起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先是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等方面,分别考察了明代、清代和近代的国内市场;90年代,又从人口、物价、财政、商税、货币等问题上,考察了16—17世纪和18—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并将最终的落脚点放在“现代化因素”考察上,即“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这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情况”。吴承明主张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应该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转换为“市场发展”。一方面,原来的史料不足问题可以解决,“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在17世纪几乎消失,18世纪再现,仍是稀疏的点,难以作宏观考察。市场发展的轨迹则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并可利用物价、货币量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线”。另一方面,代之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预设前提,可解决“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理论矛盾,从“实现现代化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推理证明为何中国能够“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⁴⁰

当然吴承明也很谨慎地提出,市场经济是一漫长的历史化过程,“不能把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即不能把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抬高到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进行理解和分析⁴¹。例如考察清代市场中最大宗的粮食贸易时,吴承明对当时市场的狭隘性就有深刻分析,指出:清代粮食的长

距离运销，“并不都是为了与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相交换”，“由于北方缺粮，需要南粮北调，但北方甚少工艺品供应南方，以致粮船回空。由于东南缺粮，东北有大批豆麦海运上海，而回头货即东南的布、茶、糖等，却常不满载，需以泥压舱。川、湘每年有大量粮米接济江、浙，后者以盐、布、广杂货等作为补偿。但这些工业品在长江上游并无多大市场，后来川、湘来米少了，淮盐也滞销”⁴²。

近些年来中外学界在评估清代经济的变化时产生很大分歧，甚至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派持保守的悲观态度，认为清代经济深受“内卷化”威胁，从而“较多讨论的是长江三角洲怎么未经历根本性的经济突破，而对这一地区如何取得经济成就，则谈得较少”；另一派则持乐观态度，认为“明清中国与欧洲有着类似的经济成长的动力”，表现为“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继续扩大”⁴³。然两派对清代市场巨大发展这一背景却并无分歧。即使前者也相当认可清代市场之发达，认为当时已出现“全国性的市场范围”：“在清代，长江三角洲的粮食运到华北，华北的棉花运到长江三角洲，东北的小麦和大豆也运到长江三角洲”⁴⁴，只不过“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已⁴⁵。

吴承明系统考察了明清以来国内市场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大致描绘出清代市场的整体面貌。清代的市场是在明代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关于明代的 market 特征，吴承明将其概括为三点。首先，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主要体现在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商业城镇的兴起。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然其数量有限。除漕粮外，其时还未出现南粮北调；长江流域的贸易仍基本局限于中下游地区；地方小市场，也仅在个别丝的集中产区发展为初级市场。其次，长距离贩运贸易有很大发展，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转向以民生用品的贸易为主，即由产品与收入的交易转化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使市场性质为之一变。部分工业品也开始加入到市场流通中来。但其时长距离贩运贸易在整个市场交易中仍很有限，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农村产品大半还是单向流出，得不到补偿和交换。第三，徽商、山陕商等大商帮已开始出现，国内市场已有相当的积累货币资本能力。但这种积累主要是从经营盐以及茶、布等商品而来，与国家政权联系紧密；大商人的资本关系限于家族范围，尚缺乏社会信用；资本数量也较小，基本在银五十万两至一百万两之间。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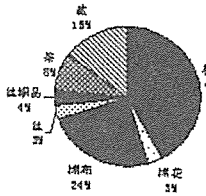
清代的国内市场较明代更有显著发展。从商路方面看，清代东西贸易有重大突破，尤其是长江一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风潮下，长江上游宜宾至宜昌段的商路被开拓出来。长江中游由于洞庭湖流域的开发，贸易亦有迅猛发展，出

现诸如四大米市之一的长沙、商业重镇汉口镇等贸易中心。南方的珠江水系也有巨大发展，尤以西江船运最为兴盛。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也出现吉林、扶余、嫩江等商业城市。南北贸易方面，北方由上海经山东半岛至天津的北洋船线重新开辟，并延伸至营口，与辽河联运；南方一路源于福建茶叶的大量出口，由江西赣江南行，过庾岭，经北江到广州的商路十分兴盛，另一路由湖南湘江南行，过桂林，沿西江到广州，也开始成为重要商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内河航程达五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则约一万公里。

清代的商人资本，除明代的徽商、山陕商、海商外，粤商、宁绍商、沙船商和经营国际贸易的行商渐次兴起。清代商人一改明代携家眷在交易城市占籍的作法，纷纷在城市中设立庄号。商人组织亦有进一步发展，会馆林立。嘉庆以后，会馆又逐渐被全行业组织工商业公所取代。清代的大商人资本，随着盐成为清代市场上的第三位商品，盐商开始衰落。布、茶、丝等商品陆续加入市场，洋货和广杂货成为一大行业。嘉庆以后，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势力已凌驾盐商。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组织还限于家族范围，清代则已有信贷的发展。市场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商人资本有银数百万两已属常见，更有诸多千万两银以上资本出现。鸦片战争前，七种最主要商品年均流通总额大致为银 3.87 亿两，人均近一两。七种商品比例根据吴承明估计制成下图。

图 2 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最主要商品比例图

从对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情况的考察中，吴承明得出结论：当时的国内市场，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其时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有三个特征：第一，粮和布是市场上最大量的两项商品，市场上最大量的交换也就是粮与布的直接或间接交换，其次是粮与盐的交换；第二，布和盐虽属工业品，但实际都在农村生产，绝大部分市场交易，实际仍是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过假手于商人和地主而已；第三，城乡间的交换商品量不大。鸦片战争前的城市手工业虽有一定发展，其产品却主要供应城市消费，很少与农村进行交换。



清代市场结构中，几乎所有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粮食相交换。然而市场上的粮食一般并非作为商品来生产，而是农民已生产出来，由商人的资本运作而变成商品。商人收购的粮食，亦非直接生产者的余粮，多半是由地主出售。尽管如

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粮食输出的数量仍可作为衡量市场规模以及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外在标志。同时,粮食的长距离运销尽管在其商品量中仅占15%至20%的比重(其余仍属于区域市场和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却基本上都与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相交换,能够集中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准。吴承明以为,清代粮食长距离贩运贸易量约为明代2-3倍,其运输路线约计10条。

除却对清代全国市场的整体性描述外,吴承明还对清代市场的整合过程进行考察。他指出,清代市场的周期性表现为:在总体繁荣趋势中,有两次衰退,一次出现在17世纪下叶,一次出现在19世纪初年。17世纪后期的市场衰退,又称“康熙萧条”,吴承明认为主要原因不是供给问题,而是市面缺银,需求萎缩所致。19世纪上叶的市场衰退,或称“道光萧条”,出现农业生产不景气与财政拮据局面,其伴随着早已出现的银贵钱贱的银钱比价波动而来。吴承明认为,银贵原因除鸦片进口泛滥、白银外流之外,还应从整个市场货币需求量和供给量方面考虑。⁴⁷

关于“道光萧条”的成因,似乎有进一步的讨论必要。在吴承明看来,“道光萧条”乃一经济周期,因此“其基本原因,概属经济因素,与战乱、灾荒无关”⁴⁸,然却未能揭示具体成因。李伯重则从江南区域入手,探讨了“道光萧条”的成因。李伯重发现,江南经济确实在道光初年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其成因却与当时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他以松江府为例,指出松江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恰恰是“1823年开始的气候反常所导致的严重水灾”。而水灾的根本原因则取决于当时的气候变化:“在中国气候史上,十九世纪初期是一个转折时期”,具体表现为温度剧降和湿度偏湿⁴⁹。

四、20世纪90年代后:清代全国性市场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学界交流的频繁,中外学者开始对清代市场以更多关注,进而提出“全国性市场”的概念。“全国性市场”,和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统一市场”概念相比,在内容上其实并无太大差别。如李伯重明确提出的“中华全国市场”概念,是指“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资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⁵⁰。

关于清代市场的讨论,30年后重回讨论起点,并不是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简单回流,而恰恰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轨迹。60年代关于“统一市场”的讨论,因其囿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线性演进的理论脉络中不能脱身,

故交锋尽管激烈，却总给人以自说自话、隔靴搔痒之感，终未勾勒出清代市场发展的整体面貌。魏永理对此总结道：有的说，民族市场“是资本主义关系在一个封建国家内开始生长起来，要求打破封建割据，加强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关系，而形成了的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但又说：“中国在明清时代所形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情形与欧洲国家所出现过的‘民族市场’是不能混淆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一定是‘民族市场’”。有的说，“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是有差别的，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有机的联系。它们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前者是从人类社会中新产生的市场，一直到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而民族市场是国内市场在发展阶段上的某一个时期的状态，是资本主义市场确立的前奏曲”。有的说，“所谓民族市场，通常指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出现和基本消除封建经济分割性的同时而形成的统一市场”。“实际上，民族市场与所谓‘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根本就是一个东西，中国也不能例外。民族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卷入市场关系中的人们已具有全国性和群众性；而所以把民族市场称之为‘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是根据同一理由”⁵¹。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理论的兴起，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历史比较，发现“一系列均衡性比较显示出，迟至 1750 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⁵²，然而这种相似性却一直但未被切实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寻求另外的某种东西。我们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上，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的原动力，与中国情况最为相类，但未必会导向 19 世纪的工业化。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工业出现，就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呢？或许，探寻‘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史学家们，不应再继续寻求那种使得明清经济发展不可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⁵³。有些学者甚至走得更远，“注意到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出现诸如“中国（17 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我们把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中国至少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等强调明清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的观点⁵⁴。贡德·弗兰克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 19 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⁵⁵。“全球化”理论的提出，也为 90 年代以后清代市场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正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李伯重提出，清代前期最终形成一个整合良好的“全

国市场”。他认为，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有五，即政治环境的改善、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和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全国市场形成的标志有四。一是商品流动；二是劳力流动；三是资金流动；四是资讯流动⁵⁶。

与李伯重的宏观描述不同，朱大为则从远程贸易入手，将全国分为五大核心经贸区，大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进行的大宗商品贸易，使全国各层次市场融为一体，全国性市场即由这一商业网络的形式得以体现并最终确立。他对其“经贸区”的概念解释道：所谓“经贸区”并不等同于“经济区”。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角度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经济区与经贸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贸区需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便捷的交通；二是有城市作为其中心点。据此，他认为当时出现五大经贸区，即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五大经贸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基础上，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和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京师及西北经贸区。⁵⁷

许檀则通过对清代商品流通宏观布局的考察，认为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她指出，清代全国商品流通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的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清代流通格局的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全国性市场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商品流通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扬长避短，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

场机制在起作用。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相当规模。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改造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其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利用了中国的原有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⁵⁸

姜守鹏、刘慧文从市场层次入手强调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清代各个层次市场——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和区域市场比前代均有很大发展，随着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勾连，全国性市场最终得以形成。最基层的市场是农村集市，北方称集市，南方称墟市，西南称场市，还有称街子、圩、亥、务等。一般来讲，清代乡村 40—50 里之间就会有一个集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与集间的距离甚至达到 20 里。相对乡村而言，第二层次的市场是城镇市场。清代城镇市场可分两种：一是市镇集市；二是商业店铺。区域性市场是第三层市场，在本区域范围内，调剂着农村集市市场和城镇市场的余缺。在此基础上，清代逐渐形成了全国性市场。清代前期形成的全国性市场中心被时人称作“四大聚”，即“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由此可见，清代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⁵⁹

当然，学界对清代全国性市场也有不同看法。

唐文基认为，清代的市场经济尚未建立。他指出，所谓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指相互关联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资讯市场等各种市场组成的有机市场体系。清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兴旺，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刚刚起步，技术市场偶而有之，资讯市场还远未产生，因此，对此不宜估计过高。区域经济的多样性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发展的诱因，然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却严重阻碍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进一步展开。清代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严重制约市场的扩大，也制约了商业向纵深拓展。⁶⁰

郑学檬认为，清代的市场经济仍停留在“萌芽阶段”。首先，货币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清代经济的一个症结，或者说一个缺陷。其次，清代市场主体和外部环境存在着结构性限制，使其难成气候。第三，清代商人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⁶¹

综上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后，学者对清代市场给予高度关注。关于清代是否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虽未达成共识，却突显出构成全国性市场的几个要素，

如国内大宗商品的流通、商路、城乡市场网络，等等。

五、简短的结语

80年代以后，吴承明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一改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老传统”⁶²，将“国内市场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条件”⁶³，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90年代以后清代市场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闭塞状态，90年代时则情况迥异。这也是推进清代市场史研究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欧洲历史经验的“普世”标准日益受到质疑，“欧洲中心史观”也遭到强烈批评。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其实，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清代市场发展的国际关联：“愈到晚近，我们的经济恐慌，就愈表现出一种二重性：它一方面尽管像在不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变动而一直为它自己内在的灾难所困厄着，同时，却又愈把它的恐慌，当作国际市场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恐慌的一个部分，而有机的发生成长起来”⁶⁴。当然，论者仍从近代中国遭受列强经济侵略的现实情景出发，却毕竟提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意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论者当时并没有全球意识的理论自觉，其论述自然不可能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

注

- 1 吴承明：《吴承明集》，第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2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第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 3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5 刘永成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清的论述简单清晰，即“指封建社会后期，即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它首先是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城市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然后缓慢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渗透到农业生产部门。这是封建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普遍规律。”参见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引自《明清

-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7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21页。
- 8 李埏：《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序》，引自龙登高所著该书《序》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9 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10 吴承明：《市场经济和经济史研究》，引自其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9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1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11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
- 12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序言”第14—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13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导言”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14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5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代序》第1、9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 16 关于此次讨论热点情形，详见动态报道：《中国历史上民族市场形成问题的讨论》，载于《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 17 希克斯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世界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呢？连文明的兴衰都可以在强加于它的周期中找到一席之地。我们应从何处着手呢？有一个转变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前提。按现代经济学的看法，这一转变似乎更加重要。这就是市场的出现，交易经济的兴起。”引自【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 18 如经济史理论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诺斯对马克思主义于经济史的总体构架方面亦贡献卓著，评价道：“很难将马克思主义模型加以约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会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之间紧张关系在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引自

-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6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19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代序》第9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 20 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21 此概念从论述本身来看，孔经纬认为与“统一的国内市场”实质并无明显区别，无怪乎要就此与其商榷。参见孔经纬：《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载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 22 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23 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24 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25 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26 孔经纬：《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载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 27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一章，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
- 28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上的几个问题》，第48—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29 李湘：《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孔经纬先生商榷》，载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
- 30 陈诗启：《近代中国没有民族市场形成》，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5、6期。
- 31 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形成的》，载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 32 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载于《光明日报》1963年5月13日。
- 33 孔经纬：《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载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 34 孔经纬：《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载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 35 陈诗启：《近代中国没有民族市场形成》，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5、6期。
- 36 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形成的》，载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 37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38 可参见：何爱国：《众说纷纭〈大分流〉》，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 39 叶坦：《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载于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出版。
- 40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第8—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 41 吴承明：《市场经济和商业史研究》，载于《中国商业史学会通讯》第7期。
- 4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4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 20—21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44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03—104 页，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45 侯且岸：《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2 期。
- 46 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载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245—24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47 吴承明：《18 世纪与 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载于《吴承明集》，第 178—18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48 吴承明：《18 世纪与 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载于《吴承明集》，第 17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49 李伯重：《十九世纪江南的经济萧条与气候变化》，载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编：《十九世纪的危机：“重新认识十九世纪”会议系列之二论文集》，参见
<http://michigan.ccast.ac.cn/conference/August2005/libozhong.doc>
- 50 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 年》，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
- 51 魏永理：《论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载于《兰州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 52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 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53 【美】王国斌：《中国与西欧农村工业与经济比较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 54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168—169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 5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169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 56 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 年》，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
- 57 朱大为：《16 至 18 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载于《福建论坛》2003 年第 6 期。
- 58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 59 姜守鹏、刘慧文：《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载于《史学集刊》1995 年第 2 期。
- 60 唐文基：《16 至 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载于《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 61 郑学檬：《16 至 17 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载于《福建论坛》1999 年第 3 期。
- 62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前言》第 4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6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64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第 251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